



贵州党史资料

第二辑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办公室编



革命年代

——

中国革命年代
中国革命年代
中国革命年代

贵 州 党 史 资 料

第 二 辑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办公室编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

前 言

半个多世纪以来，贵州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奋斗，创建过光辉的业绩，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

中国工农红军，从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六年，曾五次进入贵州，足迹遍及我省六十多个县市。红军转战苗岭高原，建立根据地、游击队，播下革命的火种，在群众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贵州地下党自一九三四年建立直至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贵州解放，领导贵州各族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迎来了贵州的解放。

云南、四川等邻省地下党，派人到贵州边境，与贵州人民一起并肩战斗。

我省无数先烈，为了贵州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用生命写下了光辉的篇章，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

贵州解放三十五年来，我省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和宝贵的历史经验。

贵州有着丰富的党史资料。

为了发掘、积累和交流党史资料，加速我省党史资料征集和整理工作，为党史研究、编写提供史料，为党史教学及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教材，我们编印了《贵州党史资料》。

《贵州党史资料》从一九八五年起，将陆续分辑编印。刊载的内容为：史料、回忆录、文献（包括文件、布告、电文、信函、日记、诗文、手稿等）、党史人物传记、专题研究（包括史论、辨证、订谬、考据）、专访、座谈纪要等方面的文章。

《贵州党史资料》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史实方面力求准确、真实。但是，有些史料由于时间久远，有较难考证之处，加之，限于作者个人见闻的局限性或记忆有误等原因，某些稿件涉及的内容，也难免有失实之处。还望知情者补充、订正，也欢迎读者批评、指正。同时，我们希望大家本着对党、对历史负责的精神，为我们提供尽可能翔实的史料。

编 者

目 录

前 言.....	(1)
----------	-------

回 忆 录

关于抗战时期贵阳中共红十字会特支的一些情况

.....章文晋(1)

我党俘虏政策的胜利(小言论).....编 者(7)

回忆镇远日俘收容所.....康大川(9)

中日人民友好的萌芽

——忆重庆“反战同盟总部”及“镇远和平村”

.....翁植耘(30)

附录：镇远“和平村”生活纪实.....长谷川敏三(34)

回顾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贵州地方队部.....周兴仁(39)

贵阳筑光音乐会.....任虹、聂奇慧、刘容容(60)

活跃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骆驼话剧社.....王绍仲 林子剑(82)

在党领导下的思南中学抗日救亡运动.....李 骥(120)

农村合作讲习所与贵州农村抗日救亡活动的开展

.....宁汉戈(126)

回忆普安抗日救亡运动.....肖维亮(135)

抗战时期我经历的晴隆地下斗争.....黄小穆(147)

盘县抗日救亡活动片断·····	黄世琮(153)
忆浙大学生在滇涪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	李 晨(157)
浙大学生在滇涪时期发表《国是宣言》的情况·····	程嗣钊(164)
交大唐院在平越的抗日救亡活动记略·····	徐大德(175)
涪潭地下党领导下的农民抗日救亡运动·····	石 果(183)
中共黔西城区支部开展抗日群众运动的回顾 ·····	蓝芸夫 余英 尹克恂(188)
抗日救亡的战斗年月·····	田伯平 (197)
坚定不移的信念·····	罗朝秀(204)
从《民先队报》看郎岱民先·····	刘定华 尹克恂(256)

综 述

贵阳“二·一九”事件始末·····	(219)
安紫边区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	紫云县委党史办(231)
涪潭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	涪潭县委党史办(244)

文 献

张立同志遗文三篇·····	陈理源供稿(251)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郎岱县队部》文献资料选辑 ·····	省委组织部供稿 刘定华、尹克恂勘校(268)

资 料

贵阳图云关红十字会国际医疗队简况·····	(5)
-----------------------	-------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贵州地方队部全体队员为请求立案

争取公开告社会人士书·····	(54)
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歌》·····	(59)
前奏曲·····	(80)
沙驼业余话剧社第二次公演特刊·····	(95)
附：《沙驼话剧社歌》·····	(118)
“二四”轰炸（小资料）·····	(152)
国立浙江大学全体学生为促进民主宪政宣言·····	(171)
黔南事变（小资料）·····	(181)

关于抗战时期

贵阳中共红十字会特支的一些情况

章文晋

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1938年成立于长沙。长沙大火后，总队部临时迁往湘南祁阳，不久后总部迁住贵阳东郊外的图云关。

红十字会是一个民间性的统一战线组织，从事战地医疗救护工作。它既活动于国民党各战区前线，也同八路军、新四军有合作关系，派了医疗队並送医药器材去延安和敌后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根据地。1940年以前，有些进步人士就是通过这条路线留在八路军新四军的。红十字会的物资，包括汽车队、药品、医疗器材及经费多是由海外援华团体（初期主要是北美西欧的左派团体）捐赠，还有些是海外爱国华侨、包括侨团侨领和劳动人民捐助的。其中不少是指定要红十字会经手转交八路军和新四军的。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来自各方，除高级医务专员、工程技术专家外，还有不少爱国青年和海外归来的爱国华侨。总队长林可胜出身华侨，是国际知名医学专家，思想较开明，受外国进步人士如美国女作家斯沫特莱的影响，对同八路军、新四军合作抱积极

态度。红十字会内部政治空气直到1940年都比较自由。

在长沙时，开始红十字会内就有来自不同途径的党员和进步青年，彼此的思想认识比较接近，但尚无统一的党的支部组织。

我到红十字会工作是在长沙由林可胜请去的，党组织也同意我去做林可胜和红十字会内部的统战工作。由于我原与林可胜有社会关系，相处很好。红十字会运输队当时从国外收到不少救护车辆，林可胜要我给运输队介绍运输工程人员以加强运输工作。我介绍了一些党员如苏有威（苏桂文）、张自清、张世恩、张式垓、马廷生等（他们也是我在清华的同学），先后到红十字会运输部门工作。还介绍了一些靠拢我们的大学生参加，他们在运输部门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我在祁阳就与黄豪（黄洪年）、孟燕堂（后来知道也是党员）共同筹划成立宣传散发进步书报的“红十字会书报供应社”，到贵阳后，这个供应社才正式成立。

1939年红十字会总部迁贵阳后，党员郭绍兴等与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取得联系，决定把红十字会的地下党员组成一个特支，受交通站站长袁超俊同志领导。

我是1940年夏才到贵阳的。因离开祁阳后，我被指定在柳州（广西）主持红十字会的搬迁运输工作，主持柳州汽车修理所并负责抢运从越南海防转来的各种器材和援助物资。我1939年不时去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联系，见到李克农、吴奚如等，他们都曾给我们指示活动方针并告诉我以后到贵阳联系。

我到贵阳时，红十字会的特支已成立，郭绍兴带我去八路军交通站见袁超俊同志。当时我是红十字会运输股的代理主任，袁要我多做上层工作，并利用运输股安置进步人员，以便能更好地为我党服务。1940年秋后，贵阳政治空气日趋恶化。袁超俊同

志同我们谈话中最后表示，交通站可能维持不久，一旦撤走，红十字会特支同志应注意隐蔽精干，改变活动方式，多单线联系。他将把我们的关系带到重庆南方局，要求特支同志不要同贵州地下党发生横的联系，以免暴露。不久，交通站果然被封闭，我们暂时独立作战。

特支从1940年下半年起不再采取召集在一起开会的形式，而是多分头活动联系。郭绍兴同志主要联系卫生工程队的党员和群众，並利用去外地工作和视察的机会同党的机关、南方局、西安办事处等保持联系。毛华强等则去卫生医护训练班中组织联系一些进步青年和党员，动员一批人去敌后根据地。

在汽车运输方面，我们安置和招募了一些思想作风较好的青年担任汽车押运员、汽油站长等，同时培养训练一些青年技工司机和职员，使他们接受进步思想，向党靠拢。由于贵阳政治气候越来越坏，遵照党的转移和疏散干部的方针，利用红十字会汽车为各地党组织通过朋友关系把许多干部转到比较安全隐蔽的地带。随着形势恶化，运输股党员也逐步撤走，如黄豪、孟燕堂、马廷生、张式垓、张自清，于1940—1941年撤离红十字会的一批工程人员和机工职员，许多先后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其中李铭三离开红十字会后，仍坚持地下工作，在解放前夕，被捕后遇害。有的司机如杨枫、卢珂先去昆明，以后到八路军当司机转往解放区。机工徐震生、熊国华，司机庄群解放后入党，分别在扬州、上海、长春担任汽车制造厂的一定负责职务。

我在贵阳除林可胜外，与一批中间高级医务专家，工程技术人员等也保持密切关系，使他们了解同情我党政策。一些高级专家如外科主任张先林，X光专家荣独山，防疫专家施正信，卫生

工程专家过祖源，内科主任周寿恺等，都同我们保持密切联系。解放后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留在国内工作。

1941年底至1942年春，国民党加紧对红十字会的控制。我们几个主要负责人郭绍兴、毛华强和我也先后离开贵阳。党员逐步转移到安全地区做其他工作去了。

〔作者简介〕

章文晋，中共党员。曾任中共红十字会特支书记。解放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我国驻美国大使等职。

· 附录 ·

贵阳图云关红十字会国际医疗队简况

贵阳图云关国际医疗队是由英国伦敦“国际医疗援华会”为了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组织了一批医务工作者，于1939年首批来到中国。全队21人，这些人的国籍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奥地利、德国、捷克斯洛伐克、英国和苏联。他们中大部份是各国的共产党人，许多人都是参加过西班牙内战之后来中国的。来到中国后，有些人曾想去延安我解放区工作，如卡内蒂、考泰勒、罗尔夫、贝克等曾去重庆会见周总理。卡内蒂曾三次见周总理要求去延安工作，周总理劝说他们安心留在后方。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工作基地在贵阳图云关，一些人还常随军去抗日前线工作。

一九四二年，一位英籍女医生才20来岁，中文译名叫康特妮（Guy—bahaia Cout—ney），用自己的身体试验鼠疫防疫针，死后葬于图云关。

另有一美籍华人林可胜医生（Rohatlin），在抗战结束后又去了美国，并为当时的军医大学安排了几十名医生去美国留学。

附医疗队21人名单如下：

1. Dr. Szumei—Mejsze Flato 苏梅尔—梅杰塞·弗拉托医生
(波兰)
2. Dr. Wiktor Jaubenfligel 维克托·乔本弗利格尔医生
(波兰)
3. Dr. Franz Kriegel 弗朗兹·克雷格尔医生(波兰)

4. Dr. Wolf Jungerman 沃尔夫·琼格尔曼医生(波兰)
5. Dr. Leon Kamieniecki 列昂·卡梅涅基医生(波兰后
去苏联)
6. Mrs. Mania Kamieniecki 玛利亚·卡梅涅基太太(波兰,
后去苏联)
7. Dr. Jacob Kranzdorf 雅库布·克朗兹多夫医生(罗
马尼亚)
8. Mrs. kranzdorf 克朗兹多夫太太(罗马尼亚,
抗战期间死于中国)
9. Miss Edith Marcus 爱迪特·玛库斯小姐(德国)
10. Dr. George Schoen 乔治·斯乔恩医生(匈牙利)
11. Janto Kaneti 詹特斯·卡内蒂(保加利亚)
12. Dr. Herbert Baer 赫尔贝尔特·贝尔医生(德国)
13. Dr. David Jancu 大卫·雅恩库医生(罗马尼亚)
14. Dr. Welter Freudmann 华尔特·弗雷德曼医生(奥地
利)
15. Dr. Alexander Wolokin 亚历山大·沃罗金医生(俄罗
斯族)
16. Dr. Carl Cantelle 卡尔·坎特勒医生(德国)
17. Dr. Henryk Kent 亨利克·肯特医生(奥地利)
18. Dr. Rolf Becker 罗尔夫·贝克医生(德国)
19. Dr. Frederik Kisch 弗雷德里克·基斯奇医生(捷
克)
20. Dr. Fritz Jenzen 弗里兹·杰仁医生(奥地利)
21. Miss Coutney 康特妮(英国)

· 小言论 ·

我党俘虏政策的胜利

编 者

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党十分重视对敌宣传及瓦解敌军的工作。1940年4月6日中央书记处发出的《中央关于瓦解敌军工作的指示》中强调指出：“加强对敌军的工作有最重大的意义，这是决定抗战胜利和引起日本革命的重要条件之一。”并指出要从“最进步的日本俘虏”中“培养出日本的革命者”。为此，党中央制定了一整套“俘虏政策”。对俘虏不仅不杀、不辱，还要医治其伤病员，生活上给予优待，人格上尊重他们，并对他们进行耐心的宣传教育，使他们认清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的非正义性，从他们中间培养出反战人物，争取他们为我们的反侵略战争服务。我们党的“俘虏政策”在瓦解敌军、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抗日战争大后方的国民党统治区，中共中央南方局及以郭沫若同志为主任委员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在贯彻党对日俘政策、瓦解敌军等工作上取得了显著成绩。南方局通过文委委员、中共文化工作委员会特支书记冯乃超，支持和协助日本左翼作家鹿地亘组织“在

华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盟”，派康大川到“镇远第二俘虏收容所”作俘虏工作。康大川按照我党的“俘虏政策”，改革了管理制度，在日俘中树立了威望。经过他耐心地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许多俘虏的立场发生了根本转变，参加了“反战同盟”，成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和平战士。在对敌宣传及收集敌军情报等方面作了很多工作。日本投降后，反战同盟的成员回到日本，不少人成为日本民主运动及日中友好运动的骨干；有的全家都成了日中友好运动的积极分子。为避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悲剧重演，他们率领子女奔走呼号，为“日中世代友好下去”作出了贡献。

康大川等同志关于“在华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盟”的几篇回忆录使我们重温了抗日战争的峥嵘岁月，展示了我党的战俘工作的卓越成效。这些文章从一个侧面显示出我党“俘虏政策”的巨大威力和我党国际统一战线工作的重大意义。

回忆镇远日俘收容所

康大川（康天顺）

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军政部所辖的日军俘虏收容所有两个，一个设在西安，叫做第一俘虏收容所（很大一部份日俘是八路军送来的）。再一个就是设在贵州镇远的第二俘虏收容所（全名：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一般也称“和平村”。第二收容所原设湖南常德，武汉失守后迁来镇远。集中了分散在长江以南各地临时收容的零星战俘。（这个收容所于1944年日寇侵犯独山时迁往重庆南岸）。

镇远日俘收容所原所长邹任之是军统特务，被军统调往上海。主任管理员姚开白是邹的亲信，也是一个军统特务，因吸鸦片的劣行败露而被解职。这时由一个叫孙必亨的上校政治员代理所长。孙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自称是郭沫若同志的后辈同学。由于管理人员人手不足，孙遂去信郭老（郭沫若）求援，由郭老与阳翰笙、冯乃超同志商议决定派我前去。

当时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周恩来同志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部长为陈诚），郭沫若同志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第三厅直接由周恩来同志领导。冯乃超担任第三科科长，负责敌情